

第 11 册

战后世界 1956-1958 历史长编

主编 时殷弘 蔡佳禾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 11 册

战后世界 1956-1958 历史长编

主编 时殷弘 蔡佳禾

编著 时殷弘 张振江
杨冬燕 蔡佳禾
吕 磊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 第11册: 1956~1958/ 刘同舜, 姚椿龄主编, 时殷弘, 蔡佳禾本册主编.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ISBN 7-208-03274-2

I. 战… II. ①刘… ②姚… ③时… ④蔡… III. 世界史: 现代史-1956~1958 IV. K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0055 号

责任编辑 严国珍

封面装帧 赵小卫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6-1958)

第11册

主编 时殷弘 蔡佳禾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 200029)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插页 4 字数 238,000

2000年3月第1版 200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208-03274-2/K·777

定价 30.0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主要汇集战后世界历史的基本资料,内容以国际关系为主。我国国内事件一般不列入本书内容。

本书按年代编写,一年或几年编为一册,以专题形式对重大历史事件作比较详细的叙述。有些重大事件,限于目前条件,未能立为专题编写,拟待日后增补。已编就的专题,若今后发现有重要史料披露,重印时或补遗或重写。

编写本书的目的,是为系统研究战后世界历史和战后国际关系史作某些准备,并供有关部门参考。

限于水平和条件,所搜集的资料很不全面,阅读时请注意分析。引用本书资料,务请核对原文,并注明原著版本出处。

本书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组织编写,主编刘同舜。

本册的出版,得到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刘名启同志和海口兴华皮鞋总汇的支持,特此感谢。

目 次

一、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	1
（一）绪言：非斯大林化的复杂起因和多重后果	1
（二）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初始的改革	7
斯大林晚年苏联内部潜在的改革倾向	7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政治和政策的最初变化	11
初始的改革与克里姆林宫内的权力斗争	21
（三）赫鲁晓夫权势的逐步增长	25
赫鲁晓夫权势的增长与贝利亚、马林科夫的相继垮台	25
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之争与苏联外交新变动	35
（四）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45
赫鲁晓夫发动非斯大林化的原因	45
秘密报告的酝酿及其在二十大的发表	49
秘密报告及其局限性	55
二十大确定的苏联对外政策新指导原则	66
（五）赫鲁晓夫发动非斯大林化的后果	78
二十大激励和推动下的苏联改革浪潮	78
秘密报告和非斯大林化的负面效应	85
二、波匈事件	94
（一）50年代中期波兰的改革和十月事件	94
斯大林去世前波兰的事态发展	95
从斯大林去世到苏共二十大期间的波兰	99

改革浪潮和波兹南骚乱	102
十月事件和苏联的退让	109
十月事件后波兰的社会和政治演变	115
结束语:波兰改革运动的特性及其原因	119
(二)匈牙利事件和美国的政策	123
动荡的背景	123
美国的初期政策——促成拉科西下台	128
布达佩斯的风暴和华盛顿的审慎	133
匈牙利事件的终局和美国政策的节制	143
关于匈牙利事件的结束语	150
三、1956 年苏伊士运河事件	152
(一)危机的前奏	152
战后中东形势	152
埃捷军火协议与“苏联阴影”的出现	155
阿斯旺水坝贷款问题	159
(二)苏伊士运河危机与西方的对策	163
英法美的反应	163
英美之间的外交迷藏	175
(三)苏伊士运河战争与中东外交格局的变化	182
英法以的军事密谋与武装侵略	182
美英之间的勾心斗角	185
苏联的危机外交与运河危机的结局	188
四、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	193
(一)日趋紧张的台湾海峡局势	193
美台关系中的齟齬	193
蒋介石拒绝“第三次国共合作”	197
陷于停顿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202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338 次会议	207
(二) 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与调整	211
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新估计	211
中苏分歧的发展	215
由“共同舰队”问题引发的争论	219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221
(三) 以战争边缘对战争边缘——危机的第一阶段	225
“中国人就是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炮击金门的目的	226
“谁是老子?”——美国军事干预政策的形成	232
杜勒斯的核威胁政策与《新港声明》	239
毛泽东论“绞索”、“脱身”与紧张局势	241
赫鲁晓夫的台前幕后	244
中美两国在护航问题上的较量	248
(四) 逐步降级——危机的第二阶段	251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恢复	251
美国的政策转变	255
中央关于不占领金门、马祖的决定	261
杜勒斯访问台湾	264
中国对国际舆论的成功争取	272
(五) 结论:危机对大陆、台湾和美国三方政策的影响	276
 五、印尼外岛叛乱和美国—印尼关系	281
(一) 印尼国内政治的基本特征和美国—印尼关系的历史	
脉络	282
政党政治的不成熟和两大阵线的对立	282
军队干预政治	285
美国的印尼政策及其对印尼国内政治的影响	286
(二) 印尼国内政治斗争的激化和外岛叛乱的开始	288

外岛叛乱的前奏:反政府集团的逐步形成·····	288
苏加诺提出“有领导的民主”·····	291
苏加诺与哈达的公开决裂和外岛叛乱的开始·····	292
中央政府解决外岛问题的努力·····	294
(三)美国支持叛乱政策的形成·····	296
对印尼事态的最初态度·····	296
支持叛乱政策的确定·····	297
(四)内战和美国秘密支持叛乱者·····	301
印尼安全形势的严重恶化·····	301
叛乱者的分裂举动和美国的支持·····	304
外岛叛乱的结局与影响·····	311

一、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 “非斯大林化”

(一) 绪言：非斯大林化的复杂起因和多重后果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联历史发展中被公认的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之一。这次大会以临近结束时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为首要内容，正式地、并且实际上是立即公开地发动了一场通常被称为“非斯大林化”的运动。该报告直截了当地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从30年代中期起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机器内部、尤其是在高级官员队伍内部进行的大大小的清洗活动，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赫鲁晓夫的这一举动，既为其否定若干由斯大林制定并仍在不同程度上继续贯彻的内外重大政策及其指导思想提供了便利，也加强了他本人的政治地位和权势。然而，西方学者大都将苏共二十大发动的非斯大林化单纯地归因于赫鲁晓夫个人的政治利益或思想情感，或仅把它当作苏联领导集团内权力斗争的结果来考察，这是非常偏狭的^①。从较为宏观的角度看，苏联历史的这一

①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蒂芬·科恩堪称例外，他批评了这种偏狭的观念。见 Stephen Cohen, *Rethink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 Politics and History since 1917*, Oxford, 1985, pp. 96—100. 在该书的第一章，他对西方（尤其是英美）苏联学作了尖锐的批判。

重大事态还有其广泛的社会动力：首先是斯大林大规模清洗及其他大规模镇压行动的成千上万受害者，其次是要求改变斯大林时代种种错误政策和体制弊端的社会群体或人士，甚至包括苏联大多数普通人民。

但是，这些要求改革的社会动力，大都只以背景因素的方式较为间接地起作用。苏联政权机器内部、特别是最高层领导内部的复杂的政治运作才是改革措施的直接来源。事实上，改革倾向随斯大林去世后即显端倪，并迅速付诸实践，逐步成为苏联政治的主流。苏共二十大并非改革的开始，而只是使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改革倾向的初始方向，首先是抛弃斯大林的大规模清洗和镇压做法，开始保障从最高层领导成员到广大中下层官员乃至普通公民的基本人身安全，并且改变斯大林留下的某些严重限制苏联人民生活水平、危及国内政治和周边环境安定的政策。随着这些紧急缓解社会紧张的最初的政策改革之后，出现了初步的体制改革，亦即彻底结束国家保安部门控制全国的局面，确立相应的法制，恢复苏共中央对政府机构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此外，贯穿于这两方面过程的是斯大林去世必然引发的体制变化：以集体领导接替个人专权，并将此确立为基本政治原则。所有这些初始的改革都或多或少地同苏联最高领导成员相互间的权力斗争相关连，都涉及到克里姆林宫内部的力量组合和权势转移。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以其政治联盟最初占据优势，他们（主要是贝利亚）在斯大林去世后立即以惊人的速度和频率主持发起了一系列政策改革措施，以便为自己争取当时在政治上至关重要的民众支持，同时缓解具有潜在爆炸性的社会紧张，以稳定政局^①。然而，贝利亚作为昔日保

① 参见阿米·奈特在此问题上根据新近解密的苏联有关档案文件所作的详细论述：

Amy Knight, *Beria: Stalin's First Lieutenant*, Princeton, N. J., 1993, Chapter 9.

安部门首脑,为绝大多数领导成员所惧恨,而长期充任斯大林事实上的秘书的马林科夫,则缺乏扎实的政治根基,多谋而不善断。赫鲁晓夫利用其对手的这些致命弱点,发动最高层同僚一举铲除贝利亚,进而彻底匡正了保安部门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滥用权势这一最严重的政治弊端。接着,他凭借自己新近形成的主要权势基础——相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迅速增强的苏共组织体系^①,及其亲自发动和领导农业改革所带来的威望,加上利用莫洛托夫等人对马林科夫经济改革政策的不满等因素,成功地剥夺了马林科夫的政府首脑地位。此后,谋求重建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两党关系的努力引发了同莫洛托夫的尖锐对立,后者的失败使得苏共二十大召开时,赫鲁晓夫在权力和政治主张两方面都已具有压倒性优势。上述几轮权势的消长和转移过程虽不等于有关改革的政治思想斗争,但却同改革的前景休戚相关。这表明,即便改革的最初主要发起者相继垮台,改革作为政治主流仍然不断发展。革除斯大林时代遗留的种种严重的弊端是历史的必然。

斯大林去世后,在集体执政的克里姆林宫主要领导成员中,最有可能成为改革的最积极推动者的便是赫鲁晓夫。他参与30年代大清洗的程度较小,因而揭露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乃至其他一些相关问题的个人顾虑也较小。而且,他对斯大林时代苏联基层情况的了解,他同地方一般干部和普通人民的联系,也远远超过他的所有核心同僚。尽管可以肯定,他不无凭借非斯大林化来谋取权力竞争中的个人政治利益这一意图,但仍如某些研究者强调的那样,他确实在内心反对斯大林的个人专权,希望通过非斯大

① Roy Medvedev and Zhores Medvedev, *Khrushchev: The Years in Power*, New York, 1975, pp. 4—6; Roy Medvedev, *Khrushchev*, Garden City, N. Y., 1984, pp. 58—59. 这一点历来被许多研究者所忽视。

林化来革除积弊，使得苏联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像他理解的那样健康发展^①。到苏共二十大举行时，近3年来的政治和政策变化已到了这么一种地步：将一切错误归咎于贝利亚已不能解决问题；不直截了当地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便很难就越来越多的、以各种方式被重新提出的历史问题向人民（以及苏联谋求与之重建关系的南斯拉夫）作出大致说得通的交代，很难较为合理地解释和维护某些已经采取的改革措施，也很难克服进一步改革所面临的思想、政治障碍。于是，在权力和影响方面已占显著优势的赫鲁晓夫便抛出其秘密报告。尽管报告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包括仅仅揭露和批判斯大林对党和国家官员的冤假错案，而对成百上千万一般党员和普通群众受害于其大规模镇压或其他伤害行动几乎全然保持沉默；只揭露和批判斯大林在1934年以后的错误，避而不谈其先前采取高压行政手段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也不揭露其迫害和肉体消灭党内“反对派”的实情；对斯大林个人专权及其错误的原因的说明甚为肤浅和片面，而且明显地不公正（即将1934年以后的冤假错案完全归咎于斯大林以及保安部门负责人，规避包括赫鲁晓夫本人在内的其他高级领导成员的责任），但它毕竟史无前例地披露和追究了很大一部分严重伤害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阴暗面，以震撼心灵的方式唤起人们杜绝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并且强调恢复列宁的党内生活原则、集体领导原则和实行社会主义法制。这个“秘密报告”很快传播到苏联全社会乃至全世界，构成了斯大林去世以来苏联最大、最具轰动效应的一个改革步骤。在其影响下，大量冤假错案迅速平反，国家法制进一步改善，

① 例如见 Medvedev, Khrushchev, pp. 91—92；爱德华·克兰克肖为《赫鲁晓夫回忆录》写的绪言，《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6页。

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和民主程度明显增进,官僚主义得到了一定的抑制,官员特权被广泛地削减,文艺和思想领域的改革潮流迅速高涨,经济改革也有新的进展。在对外政策指导原则方面,苏共二十大也带来了重要变化:与非斯大林化同步,赫鲁晓夫在公开向大会作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中,事实上局部否定了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思想,提出“和平共处”总路线,并强调“通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原则。这些变化,是以斯大林去世后便逐渐展开的对外政策种种实际修改为基础的,其中特别重要的,包括谋求缓和美苏对抗和欧洲紧张局势,着手同若干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友好往来并扩展苏联在那里的政治和战略影响,争取重建苏联—南斯拉夫两国乃至两党关系以及有限地松弛对东欧盟国的内政控制。苏共二十大在苏联对外政策方面的作用,实际上主要在于肯定这些修改并予以某种理论化。

苏共二十大对苏联以至东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进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它们真正有可能通过匡正斯大林时代形成的严重弊端,为较为健全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国家发展造就体制和政策条件。这在某些改革非常缓慢或发生逆转的东欧国家(尤其是匈牙利)是必要的。就苏联东欧以外的共产主义运动而言,苏共二十大也提供了一个有利于清理错误、增进活力的促进因素。可以说,社会主义的历史迟早要迈出、也应当迈出揭露和批判斯大林这一步。但由于斯大林时代历史的高度复杂性,斯大林问题关系到苏东社会主义现行体制的几乎所有重要方面,并且涉及各国共产党的基本历史和路线方针,要迈出这一步而不“伤筋动骨”,就需要在开拓精神之外具备高超的思想水平和讲究火候与分寸的政治才干。赫鲁晓夫恰恰欠缺这后两大素质。他的秘密报告虽然也有些肯定斯大林功绩、肯定3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词句,但苍白无力,抽象空洞,既谈不上对之作出必要的阐释

(它们同斯大林错误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没有在原则高度上提出并强调分清社会主义尚存的严重缺陷和社会主义的生命力这一关乎全局的重大问题。与此相关,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不仅相当简单化,也相当情绪化。几乎只有耸动情感的揭露,而无冷静周到的评析,因而难以规避感情化政治所必然带来的不利反应。然而,更严重的是,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并没有在苏联国内、东欧和整个国际共运中就揭露和批判斯大林做过必要的思想和组织准备,甚至至少有关于这些准备的必要性的认识。在对可能的消极后果缺乏估计的情况下,试图一蹴而就就以突然方式发动非斯大林化,并且无视各党各国的实际而一概迅速输出之,势必造成严重震荡。尤其是政权根基和社会控制能力远比苏联薄弱的东欧国家,更难应付非斯大林化的巨大冲击。这一错误或失策可谓代价高昂,它们不仅作为基本原因之一促成了匈牙利的大悲剧,而且导致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在二十大过后仅四个月就又一次矫枉过正地采取刹车措施,从而在若干重要方面长时间地延误了苏联的改革。

苏共二十大和苏联改革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斯大林问题。它涉及苏联历史的一个长时期里政治、经济、社会的基本体制和面貌,涉及如何描述苏联国家在这整个时期里的运行轨迹,又如何评价其成败得失和历史功过。对这个问题予以怎样的界定并持有何种认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苏联变革的态度以及对变革方向和限界的期望,而所有这些又直接关系到亿万苏联人的不同利益、信念和情感。作为现代最大的历史公案之一,斯大林问题的复杂性如科恩所指出,来自斯大林及其治国模式(“斯大林主义”)的两重性——既造就了宏伟的历史功绩,又犯下了惊人的历史过错,而且这功绩和过错往往难以分离、互为因果^①。这尤其表现在他赖以

^① Cohen, *Rethink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 pp. 93—94.

急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基本政策方面，它们成绩巨大，代价高昂。此外，在苏联 20 年代后期党内斗争、30 年代末对德政策、战后东欧政策和冷战政策等方面，也存在着功过并存并且往往互为因果的情况。这就使得合理地确定功过比例变得非常困难。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特别是 30 年代中期开始的大清洗、战后若干大冤案、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以及打击南斯拉夫等问题上，斯大林的错误是比较容易判断的。但在其他许多问题上却并非如此。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所针对的，大抵就是这些较容易判断的方面，这显然远不足以解决斯大林问题。事实上，确定功过比例的困难也强烈地表现在赫鲁晓夫本人身上。从秘密报告开始，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问题上总是把握不定，左右摇摆，甚至他倒台后私下口述的回忆录也鲜明地显示了这一点。这并非出于他所受到的党内外政治制约或担心引起动乱的考虑，而是他内心深处矛盾和混乱的表现。这种复杂性正是苏联改革的一大界标——苏共二十大及其后果的基本特征。

（二）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初始的改革

斯大林晚年苏联内部潜在的改革倾向

自 30 年代中期发动大清洗到去世，斯大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产生了多方面的恶果，其中最直接、最突出的，便是非常严重的社会紧张和国家机器内部紧张。

这样的紧张状态不可能经久持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相当广泛地出现了倾向于要求缓解紧张、进行改革的社会情绪，尽管其表现形式分散，并且多半是消极的和不易辨认的。这一动向的诱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斯大林为动员和团结全民进行卫国

战争而采取的宽松政策和鼓励政策。前者主要是松弛对民众的行政强制,特别是减少保安部门的肆意妄为,后者则指以种种方式鼓励民众相信,战争胜利后苏联将开始一个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公民权利逐渐增多的新时期^①。然而,战后不多久,怀抱希望的苏联民众发觉他们将重新回到战前状况,无限期地为国家军事—重工业作出牺牲,因为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对莫斯科选民发表的著名演说中,高度肯定战前发展模式,表示要像先前那样再搞几个五年计划或更长时间来发展军事—重工业,以便使苏联具备“不会发生任何意外事件的保障”^②。这篇演说以及此后恢复甚而加剧高压控制的具体由来,尤待历史学家予以足够全面和细致的探讨,但可以肯定,美国对苏政策渐趋强硬只是其部分原因、而非主要原因。随民众期望破灭而来的,不仅是默然忍受,还有广泛的以消极方式出现的抵抗倾向,其例包括集体农庄内普遍旷工怠工,劳动生产力下降,对国家政治和官方思想异常冷漠,男人酗酒成风,各类专门职业者敷衍塞责,艺术丧失创造激情。“在仍然强烈追求内心正直的人们、尤其是青年中间,福音派宗教以地下形式重新萌发,并出现了导向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反对派政治思想的倾向……除军工生产和重工业这样的领域外,国家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出现了衰退迹象。”^③

斯大林晚年,与多半以消极方式表现的民众情绪相应,苏联官方内部出现了比较积极、但甚为微弱的改革主张。它们在非常不利的国家政治环境中,审慎地触动并试图曲折地修改斯大林模式

① Robert Conquest, *Stalin: Breaker of Nations*, New York, 1991, pp. 269—270.

② 该演说全文见《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41—453页。

③ Robert C. Tucker, *The Soviet Political Mind: Stalinism and Post-Stalin Change*, New York, 1971, p. 188.

的某些理论前提和基本政策。斯大林一贯用“资本主义包围”来概括苏联所处的基本国际环境,由此推导并说明其治国模式乃绝对必要。然而据苏联党刊《布尔什维克》1951年第16期显露,“有些同志”隐约地针对这项带根本性的论点,提出欧亚众多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已消除了对苏联的资本主义包围。马林科夫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1949年十月革命节前夕发表的一篇报告中,与众不同地称苏联“从未像现在这样”“由对我国如此友好的各个邻邦所环抱”。尽管这样的新说法自1951年起再三遭到强烈谴责(《真理报》和苏共首要理论刊物《共产党人》迟至斯大林去世前一两个月仍在强调,“只要资本主义仍然存在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谈论资本主义包围业已消除便是错误的”,“只会引起自满情绪,导致掉以轻心,钝化革命警觉”),但这指责本身就显示了问题的奥秘^①。触动斯大林模式之理论前提的企图,还涉及同样被用来说明苏联必须依靠国家集权体制高速发展军事—重工业的另一主要信条: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在他去世前5个月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斯大林着意批判“有些同志”认为这一论点已经过时,并列举他们的理由是资本主义大国领导阶层已经吸取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美国现已能够控制世界资本主义阵营的基本事态,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已不如整个资本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那么尖锐,世界和平力量已强大得足以阻止另一次世界大战。斯大林坚决拒绝这种看法,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某些变化绝未消除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甚至称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矛盾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激烈了。尽管这里透露出来的歧异仍属蛛丝马迹,但它们实际上并非纯粹的理

① 《真理报》1949年11月7日,1953年2月6日;《共产党人》1953年第2期,第19页。转引自 Tucker, *The Soviet Political Mind*, pp. 94—96.